

让幼苗承担毒地之痛于心何忍

周东飞



今日论语

在媒体4月17日报道“常州外国语学校搬迁新址后学生出现环境异常反应”一事之后,常州市委、市政府于当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联合调查工作组,展开相关调查处置工作。

只能说,这里的“立即”是针对新一轮的媒体报道而言。事实上,早在今年1月,就可以看到媒体关于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因环境问题而出现身体异常的报道。也许在当地政府那里,事态的紧急仅是指舆论压力的紧急而已。至于学校和学生,在上述新闻报道中,当地政府仍然在强调“……其余

学生全部到校……其他教师全部到校,学校教学秩序正常。”

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给学生们带来困扰的仅仅是化工地块土壤修复过程中散发的异味而已,除此之外,土壤修复工程顺利通过了验收,学校、家长委托的专业检测机构也给出了检测指标符合国家标准的结论。如果真的是这样,媒体的相关报道岂不是成了空穴来风,哪里还有必要成立联合调查组紧急应对呢?解决问题的办法,永远都不应该是消除“问题感”这么简单。

这样的事实是没有办法轻轻抹去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先后有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有493人出现异常症状。1月29

日,环保部通报称,从这所学校一路之隔的化工地块挖掘出1500立方米含刺激性气味的污染土壤和被填埋的固体废物,经检测证明,污染物系总石油烃和苯类物质超标。学生的身体异常,与近在咫尺的毒地之间有没有关联?家长们的诉求不过是,别让自家孩子在毒地旁读书。

伴随着房价和地价高涨,毒地这个概念已经让人们不再陌生。2014年4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在调查的81块工业废弃地的775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4.9%。有业内专家表示,保守估算我国潜在污染场地数量在50万块以上。此前人们更关注的是住宅开发所涉及的毒地

问题,早在2012年环保部就曾强调,受污染的土地不得进行住宅开发。但是,今天我们似乎突然之间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在毒地的旁边,可以建设学校吗?

其实,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问题。就如同我们不需要去问,奶粉当中是否可以添加三聚氰胺。将一所学校的新址规划到一块毒地的旁边,这已经是规划之盲。在家长提出异议的几个月中,用各种理论和数据来论证毒地的无害,这更是让人震惊。毒地之痛,已经是莫大的教训。让孩子们来承担这样的后果,于心何忍?但愿“依法处置,绝不姑息”之类的承诺,在掷地有声之后,能够换成孩子们的一张附身符。



新民随笔

赏樱的“喜”与“悲”

卫蔚

前几天,好友从日本“直播”富士电视台的新闻特辑《中国式赏樱》,从东京到大阪,聚焦让日本人瞠目结舌的“中式看花十八招”。

从内容来看,特辑除了报道诸如随便摘花、摇枝等不文明现象外,最让节目“重点报道”的,莫过于中国妹子大妈克服各种地理环境不便,哪怕踩在朋友肩上,也誓要与樱花来个亲密接触;留下合影,晒在朋友圈里立证。面对采访,大妈们还振振有词地表示,这是中国人接近自然的方式。而另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更是反问记者,站着不碰花而拍照不是很傻吗?她还兴致高昂地对着镜头展示虚化其他路人、只拍“美女嗅花香”的独门秘技。于是,包含着不明意味的日语画外音适时响起:“原来是这样的啊……”

这几个颇让日本媒体费解的赏花举动,若是放在中国的公园里,大多不会被划入“不文明”的范畴。不过,熟悉日本文化的人都知道,日本人赏樱,并不是欣赏它的花团锦簇、灼灼其华,而是带着莫名的忧伤,在花树下一坐一天,凝视着它灿烂地盛开,又缤纷地凋谢。因此,日本文人描写樱花,悲伤的远多于赞叹的,三岛由纪夫就曾用苍凉的笔触描写落樱:“飘落在神社长满绿青的房顶上的樱花分外娇艳,从深檐阴影的黑暗中,连绵不断地穿落而下,叫人难以舍弃,就如同金箔从全景灿漫的描金屏风中剥落下来一般。一种可怕的失落感。这就是春天,这就是樱花。如果这就是日本之诗,那么我感到我生在了一个可怕的国度里。”在日本人“集体落寞”的时节,大批涌入各大胜地、用中国式赏樱法抒发心中喜悦的中国游客,自然就成了日本人眼里的“异类”。

樱花本是无情物,且悲且喜皆由人。在怀着怎样的心情赏樱这件事上,两种文化的差异,很难说孰是孰非。不过,若是中国游客少些攀爬拽枝的举动,减些喧闹的分贝;作为东道主的日本人,多些理解中国人对春日花开的欣喜,多些谅解宽容,特辑中那位为富士台采访本国同胞的中国籍记者,也许就不用时不时露出为难尴尬的表情了吧。

新民新语

春天花会开

范洁

谷雨三朝看牡丹。牡丹也作“谷雨花”,迟开独立不争春,自古以来大气华贵为世人所期待、所赞誉。

在金山区朱泾镇,就有一个以牡丹为名的村子。据《新农志》记载,两百多年前,当地秦氏先祖造房时,偶然在河中拾到花梗一枝,种在天井东南角。每年暮春,花开深红,花蕊金黄,花瓣内卷而浓厚,花期历久而不落,称为红牡丹。相传,全国只有两株半,这株即其中之一,牡丹村由此得名。

故事还有一半。1969年,因施牛血,造成肥害,红牡丹枯萎死亡。从此,牡丹村里无牡丹,这种遗憾持续了近五十年,俨然成为村民的一块“心病”。直到去年6月,新上任的村支书走访询民意,“牡丹花开”为民心所向,于是村镇班组与秦氏后人共同栽下三株幼苗。

前些天,我去秦家老宅看了,虽无缘再会那朵“牡丹之皇”,但新栽的三株花开正盛,遇上了年纪的村民,他们也会笑说“牡丹花又回来了”。今年,村里还计划打造一条“牡丹埭”,给80余户每家送上两朵牡丹花,种在屋前河畔,开出一个名副其实的“牡丹村”。

名字,寄托了最质朴的期盼与向往。有趣的是,或是先天垂爱,或是后天有意,还真有不少“村如其名”的故事。例如,在今年获评上海市“美丽乡村”的示范村中,浦东新区新场镇果园村,就以“新风蜜露桃”等蔬果名扬全国,斩获多个农产品金奖;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发展水产养殖业,营造“人在岸上走、鱼在水中游”的水庄图景。

当然,村如其名,也非易事。嘉定区江桥镇幸福村,今年年初列入吴淞江沿岸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区域。我曾到村里走过,违法搭建密布,垃圾肆意堆放,污水直排入河。“幸福村民不幸福啊!”现场调研中,一位区领导直言,并承诺年底“交账”。

让牡丹村开出牡丹花,让幸福村民真正幸福,平白到名字就说清道明的民计民生,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用心用意呢?

今日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希望,花开不会太迟。

快捷酒店还能不能让人踏实睡觉

日报观点

近日,媒体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北京,7天、速8、海友、星程、格林豪泰等快捷酒店甚至个别星级酒店存在把洗涤业务外包给黑洗涤厂的情况。毛巾、被子、床单等,经过这些洗涤厂的强酸碱洗,变得雪白明亮,却给消费者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在前一阵如家和颐酒店事件刚过不久,快捷酒店又一次陷入了舆论漩涡,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出事的又是快捷酒店,还能不能让人踏实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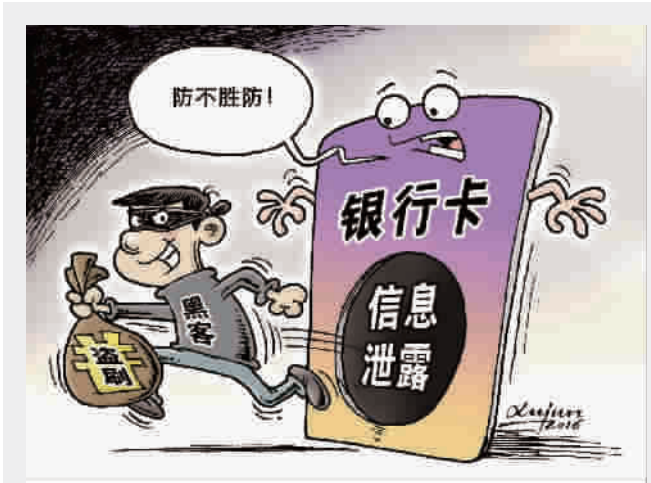
从历史上看,快捷酒店最早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属于经济型酒店的一种。因其性价比优势,颇受人们欢迎。然而价廉并不意味着要牺牲安全,对于酒店行业同样如此。商家为了利润,适当地降低成本可以理解,但无论如何不能以侵害消费者权益作为代价,这是行业的底线和准则,如今侵害消费者权益却成了行业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近些年来,中国的快捷酒店发展十分迅速,由于商家太多,使得这个行业形成了混乱的局面,不时传出有关快捷酒店的黑幕。这次报道的“黑床单”事件,早在2014年

已被央视报道过,然而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对于这样的事件,仅仅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完善的行业标准,没有有效的奖惩机制,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需要规

范快捷酒店行业市场,根据实际情况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优化行业质量,加强行业监管,形成行业自律,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在快捷酒店住得舒心。(俞诗逸 刊今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有删节)



信息泄露

央视调查称,在网络空间中存在着一个规模庞大的盗取银行卡信息的黑色产业链。在黑市中,5分钟就能买到1000条包含了姓名、卡号、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密码的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泄露,银行卡内的资金就面临被盗刷的风险。

徐骏 画

自由谭

曹文轩荣获本届国际安徒生奖,这确是天大的喜事,我和许多读者、同行一样,知道这消息后,非常激动和振奋。然而,很快,看到网上到处是“中国儿童文学登上世界峰顶”的报导,不禁又有点担忧起来。这几天,令人担忧的说法、提法越来越多,遂写此短文,意在浇点冷水。浇冷水无恶意,不是要让人感冒,只是为大家都别糊涂。

首先,国际安徒生奖是个人奖,不是集体奖,更不是国家奖。它只是对某位作家创作成就的肯定,并不代表对某一国总体水平的衡量。有人认为既然国际安徒生奖是国际儿童文学界公认的最高奖,此次奖落中国作家囊中,说明中国儿童文学已达世界最高水平——我以为,这恰恰是基本概念悄然更换,即将某中国作家与“中国儿童文学”相混了。中国儿童文学确已达到很高水平,这是就一些有

获奖只当它获奖

刘绪源

生活、有思想、有童心,也有独特创作个性的优秀作家的创作而论;但同时,总体上也存在许多问题,我们不能以优秀作家的存在来掩盖确实存在的不足,不然不利于我们继续前行。我所说的,包括:“商业童书”泛滥,许多作品故事雷同,不少作家习惯于简单说教,偏重认知却不重视审美与想象,因市场好导致创作上粗制滥造,出版社急于赚钱不事质量把关……凡此种种,都显而易见,我们正应趁现在的东风,努力予以克服才好。

其次,获奖只能当它是获奖,并不宜吹擂太过。鲁迅当年对诺贝尔奖就曾保持警惕,认为中国作家获奖对中国未必有好处,这担忧其实是有道理的。我们这里确有太强的吹擂爱好。举例而言,在还没有人获国际安徒生奖

之时,许许多多出版物上,就已出现某某作家“荣获第九届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的介绍。我们知道,国际安徒生奖是不设提名奖的,那几位只是获得过“提名”而已。而此奖的提名没有限制,提名方式多样,每年全世界有为数众多的作家获提名,所以,这很像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一样,本身并不是荣誉,但被我们吹擂成了莫大的荣誉。何以故?很简单,市场需要,商业需要,对推销有利。当一切都变成叫卖的时候,本来很崇高的国际安徒生奖(此奖没什么奖金,就是一块奖牌,由此可见其品位)就会被弄得很俗。

再次,虽是世界最高奖,又是个人奖,获奖者仍未必就是世界第一。俗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曹文轩无疑是中国最优

秀的儿童文学家之一,创作实绩赫然在焉,确属实至名归。但我以为,各届此奖得主的创作成就并不是划一的,其实还是有高低。就拿曹文轩来说,我非常喜欢他的《草房子》等作品,这有以前的拙评为证,但如真要同安徒生、林格伦、米切尔·恩德、E·B·怀特的创作相比,那我以为还有差距。指出差距,将有利于前行,并不是什么坏事(这肯定要比盲目吹擂好得多)。本文似不宜展开,但我可说一点个人的希望或观感。以下是我在文轩获奖前夕说过的话,至今仍持相同看法,抄之以作本文收束——

曹文轩作品有很强的故事性和感染力,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有很高的文学品位。但我以为仍有继续发展的余地。在他今后创作中,在追求纯美的同时似可更兼及美的复杂和多样,在追求诗意的同时或可更保留人世原生态的质朴,在机智而大气的故事进展中不妨有更多托尔斯泰或福楼拜式的“笨拙”。